

左权：『太行浩气传千古』

□ 王恩宝

左权，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将领，无产阶级革命家、军事家。1942年5月，在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突围中不幸牺牲，年仅37岁。朱德在《吊左权同志》诗中写道：“名将以身殉国家，愿拼热血卫吾华。太行浩气传千古，留得清漳吐血花。”

躬身前哨侦察，侧击制胜

1937年8月，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，左权任副参谋长。左权

细心、沉着、理智、负责、积极，体力、精力充沛，作战经验丰富，指挥能力强，是部队参谋工作中难得的人才。

1938年2月，日军进犯临汾。当时，周恩来正在临汾八路军办事处。21日，朱德、左权从临汾率部奔府城（今安泽县），准备向上党盆地进发，创建与巩固太行山根据地。这时，正值日军进犯府城。朱德在左权的建议下，决定迎击并拖住敌人，使临汾的机关安全转移。战斗中，左权先是带领战士利用有利地势有效打击日军，随后带领骑兵机智迂回、突袭日军侧翼，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。临汾遭遇战歼敌200余人。同时，由于奋力阻击赢得了时间，使周恩来在临汾的工作得以顺利结束，并保证了府城至临汾四五十个村庄的群众安然脱险。罗瑞卿评述道：“1938年春，日寇进犯临汾，与我总部遭遇，左参谋长躬身前哨侦察，侧击制胜，迄今军中称道不已。”

4月初，日军在晋西南分9路进攻129师并妄想“围歼”八路军总部，摧毁太行山抗日根据地。按照部署，左权制定了变内线为外线、变被动为主动，在运动战中打破日军围攻的战略战术。左权带领部队以急袭手段打击主要一路日军，在长乐村歼敌4000余人，收复辽县（今左权县）等18座县城，使上百万群众从敌人极端残暴统治下解放出来。长乐村战斗是全国闻名的战斗，为晋冀鲁豫抗日解放区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左权高兴地说，咱们军队和人民好比两个拳头，只要配合得好，日本鬼子就是有三头六臂，也不愁不打它个稀巴烂！

1940年8月，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。在关家脑战斗中，彭德怀、左权的指挥所离前沿阵地很近。危急关头，左权请彭德怀转移到安全地带，自己留下守候在电话机旁，临危不惧。当他正在阅读作战情报时，敌机从头上呼啸而过，炸弹爆炸，将指挥所的庙后墙震塌，强大的气浪还把庙顶掀掉一角。警卫员建议将指挥所后撤，左权扫视了一下刚被炸弹揭开的古庙“天窗”，俯身抓起一件衣服包住电话机命令说：“指挥所的同志全部向前推进，犹豫等于死亡！”然后他回过头来严肃地告诫警卫员：“一个指挥员怎么能考虑个人安危，战士们离不开我们，他们在浴血苦战啊！”

李达曾回忆：“我亲眼看到左权副参谋长，时常废寝忘食，运筹帷幄；冒着枪林弹雨，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，指挥部队勇猛杀敌。为了胜利，历尽千辛万苦，使我永生难忘。”

理论修养和作战经验兼备的军事家

左权是“两杆子”——枪杆子、笔杆子都过硬，是既有丰富作战经验又有深厚理论修养的优秀军事家。左权之所以能有力地指挥部队不断取得胜利，同他的深厚军事理论修养密不可分。他曾经就读于黄埔军校、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，是学历最高的八路军将领之一。毛泽东曾赞扬他：“左权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，这个人硬是个‘两杆子’都硬的将才啊！”

无论军务多么繁忙，左权总是挤出时间读书，十余年如一日。他的阅读范围很广，除中共中央、毛泽东的文电指示和著作外，还有俄文版《列宁全集》《苏联红军丛书》，德国的《论新战术》、克劳塞维茨的《战争论》等。对曾国藩、左宗棠的文集，他亦经常阅读、研究。由于他知识渊博，在观察与分析形势时，能高屋建瓴、抓住关键。他给干部讲课、作报告，能旁征博引，谈笑风生，引人入胜。他曾与刘伯承合译《苏联工农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》，1941年《前线》杂志连续刊载了第一部。1942年，八路军总部发布命令，将此译著作为步兵战术基本教材，并指出：“今后本军关于现代步兵战术的研究，均应以此为蓝本。”

左权军事理论根基深厚，但从不好为人师。刘伯承、邓小平曾回忆道：左权“曾以译文嘱伯承核对，偶有改动处，必细心研究之。其海人不倦与自修虚心如此！”刘伯承经常向身边工作人员说：“我在语文上有两位老师，中文请教小平同志，俄文请教左权同志。”

左权在华北敌后5年，凭着极高的政治热情和惊人的革命毅力，著译20余万字，极大促进了八路军军事理论建设。周恩来称他为：我党当之无愧的“一个有理论修养，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”。

爱护战士，心系群众

左权是八路军的高级指挥员，但他平易近人，在士兵中间素有“贴心人”之称。他特别关心战士的进步，总是抓住对战士进行教育的机会，是战士的好“先生”。

左权对1937年4月来到他身边的警卫员景伯承，从关心生活、工作入手，进而帮助其学习和思想进步。一次，景伯承突然病倒，发着高烧，迷迷糊糊睡着了。醒来一看，左权正坐在床边用手抚摸着他的额头。见他醒来，左权关切地询问，并安排卫生士 endpoints 可口饭菜。

首长的关怀，使景伯承感激万分。景伯承有时想家，左权适时开导：想家很正常。打日本，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，有家就有国，有国也有家。想了，可以写信回去问候，告诉家里自己在打日本侵略者，保卫家乡救中国！在左权的帮助下，景伯承进步非常快。

一次，左权去看望一位从延安新调来司令部的科长。左权问长问短，发现床上只有一条被子，并没有垫被。过后，左权亲自询问供给部门得知，垫被已分光，只能以后有了再补发。回到驻地，左权立即让警卫员把自己的一床棉被送给那位科长。当警卫员问他自己用什么时，左权指着床上又薄又窄的被褥说：“我有这条够了。太热，也不好。快把棉被送去！”警卫员知道左权的脾气，执拗不过，只好把棉被送了回去。

总部四科科长林海云从1937年至1940年都和左权朝夕相处。组织决定调他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做经济工作，他想不通。左权找他谈心说：“我们活着的人想起死去了的先烈，心里就难过。你我都一样，没有权利对党交给的任务挑挑剔剔。作为一名革命者，特别是共产党员，应该时刻准备着，服从党的事业的需要，直到自己停止呼吸。”经过左权的耐心帮助，林海云思想疙瘩解开，去了地方工作。

抗日战争是人民战争，作战的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有力支持。左权时刻不忘群众、关心群众安危。

1941年夏，左权率部进驻漳河两岸，带领军民开荒种地，把荒滩变成“聚宝盆”。与此同时，群众也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。左权指出：“人民是水，我们是鱼，水多了，鱼也活跃了。抗战，抗他个十年八年，只要日本鬼子愿意，我们可以奉陪到底。”

1942年1月，左权在辽县麻田召开警备部队连以上干部会议，作《关于财经问题》报告。他掰着手指头从衣服、鞋子算到小米、萝卜、山药蛋，从枪炮、子弹算到铅笔、茶叶、纸张。他说，这些开支都是老百姓给我们解决的，老百姓也很穷，每一点东西都来之不易。

1942年2月，八路军总部从麻田转移。在彭德怀、罗瑞卿等人先行撤走后，左权指挥警备连殿后。他在自己很危险的情况下，还心系群众安危，指着一处山头叮嘱警备连连长：“那里有老百姓，敌人不上来便罢，要是上来，你们就展开麻雀战，绝不能让鬼子糟害老百姓。”最后帮助当地百姓安全转移。

革命将帅

陆军全域机动作战须具备六把“硬刷子”

□ 武青平 黄春成

陆军转型建设的目标指向是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新型陆军，而检验和衡量现代化新型陆军建设成效的唯一的根本的标准，应该主要看是否真正完成了向全域作战型转变，具备了名副其实的全域机动作战能力。当前，在战争形态发展演进的倒逼、国家安全利益维护的呼唤、史上最牛军改红利的助推下，陆军不断强筋壮骨、换羽涅槃，奋力向“新型”迈进。其“形”向以疏散部署、棋盘布势为特征的态势隐形化迈进；其“质”向数字化、立体化、特种化、无人化新质力量迈进；其“态”向以模块化编组、积木式组合为特征的精干充实、合成多能方向迈进。这几个维度的迈进，都以不约而同迈向全域机动作战能力提升为目标。结合新型陆军使命任务的新拓展、组织形态的新变化、作战方式的新运用和武器装备的新发展，新型陆军全域机动作战要具有六把“硬刷子”。

实时全维感知的“硬刷子”。陆军全域机动作战是陆、海、空、天、电等多维立体的机动作战，战场态势变幻莫测，瞬息万变，要“知己”更要“知彼”。要拥有强劲的情报体系作支撑，凭借信息网络系统的互通性、即时性和共享性，具备全天候、全天时、全方位侦察、监视和定位战场的能力，具有较强的信息获取、情报侦察和信息共享能力；指挥员和指挥机构要对战场环境了如指掌，对战场局势了然于胸，基于一“幅图”“一张网”“一平台”，敏锐洞察敌情动态、实时知晓态势变化，精准预测战局发展，交互同步谋划决策，料敌于先，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。

迅疾如风快反的“硬刷子”。“以快制慢”，赢得时间窗口是陆军全域机动作战的重要原则。当某一战略方向出现威胁或多个方向连锁反应时，无需人员装备补充，无需临战训练铺垫，敏锐洞察，适时聚散，灵活机动，迅即抵达，疾风骤雨式行动，势如破竹式制敌。以联为要，与其他军兵种同步筹划、紧紧握手，密切配合，无缝融入联合作战体系，以最精力量最优方式拥抱体系版块，最大限度提升对体系作战的贡献率，最快速度释放体系作战威力效应。

远程快捷投送的“硬刷子”。战略投送能力是陆军投棋布子、快速机动、实现战略意图的关键环节。战争时间缩减，带来作战快节奏，作战节奏加快势必要求部队战略投送能力水涨船高。“24小时运来一个营，远比10天后运来一个师更重要”。陆军全域机动作战是跨区甚

至跨国作战，机动远、力量多，受威胁大，必须具备依案而行、蹄疾步稳、隐形匿迹做好投送准备的能力，具备最短时间将作战力量投送到指定地域的能力，具备通过综合投送、直达投送、接力投送、伴随投送、人装混合等途径实施战略投送的能力，做到跨域、跨疆、跨界“投得快、投得远、投得准”。

善攻可防能慑的“硬刷子”。多元安全威胁和战争形态新变化，要求陆军必须具备多元多维威慑能力，以精干高效的力量结构、相对优势的武器装备、能打硬仗的拳头部队和系统完备的战场建设，对挑衅之敌，铁拳迎击，强硬威慑；对潜在威胁之敌，亮“撒手锏”，压制慑阻。陆军全域机动作战必须攻防兼备，即，在多维战场空间，联袂诸军种力量，实施信火一体多域精确打击；在网电“刀光剑影”中软硬并施，破网断链；在快速机动中打敌七寸，瘫敌体系，谋求“梁断房塌”之效。在攻如猛虎的同时，还能通过犀利的信息攻防和火力突击，以攻助防、防中有攻，打造攻防一体、固若金汤、自我愈合的防御体系。

诡秘特战破袭的“硬刷子”。开战即在敌腹地打、纵深打，已成为现代战争基本交战模式。陆军全域机动作战，要求特战从后台走向前台，从配角走向主角，从辅助军事行动走向主要作战行动，必须具备挥洒收放、游刃有余的指挥力，神出鬼没、出敌不意的机动力，形散神聚、高度耦合的行动力，精确快速、直指要害的引导力，拔点夺要、巧兵破体的破袭力，如同群蜂一样驰骋于广阔无垠战场，以小战、精战、速战、巧战直捣黄龙、“围魏救赵”、犁庭扫穴。

制胜多种军事行动的“硬刷子”。全域机动作战应对的既有传统威胁，又有非传统威胁。要求陆军无论是进攻、防御，还是面临我海外利益受到威胁、国内外恐怖活动、各种自然灾害等非战争军事行动，能够视不同行动类别，迅速转角色、换兵器、变战法，身怀集战略投送、侦察预警、指挥控制、应急处置、综合保障于一体的本领绝技，盘马弯弓，引而待发，时刻保持全域多向、立体投送、尽锐出战、到位必成的备战水准，一旦出现危机，能够第一时间出现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任务区域，以超常行动和非凡手段“重锤定音”、胜利收局。

军事时评

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，为争取战略主动，在贵州、四川、云南边境地区，成功进行的一次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性战役。从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开始，到5月9日胜利渡过金沙江为止，历时3个多月，共歼灭和击溃敌人4个师、2个旅另10个团，俘敌3600余人。在毛泽东、周恩来等的领导下，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，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企图，导演了一幕精彩绝伦、威武雄壮的活剧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，是我军革命战争史上的光辉典范。

依据敌情变化，及时调整作战方向，稳操战场主动权。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，或东出湖南同红二、红六军团会合，调集了150多个团，近40万重兵，欲将红军围歼乌江西北的川黔地区。而此时的中央红军只有16个团，3万余人，面临着前有长江天险，后有重重追兵，头顶上飞机袭扰的极端险恶形势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毅然放弃建立川黔根据地的打算，决定率领中央红军跳出敌人重围而北渡长江，以开创川西或川西北根据地。但是红军一渡赤水后，由于敌情急剧变化，川军刘湘采取了“北守南攻”的两面作战方针，即对川北红四方面军采取守势，对进入川南的中央红军采取攻势。面临各路敌军奔集川南四面围追堵截的新情况，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当机立断，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，在扎西地区集结，以保存军力，寻求新的机动。

毛泽东指出：“红军的作战线，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……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，然而大方向

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，一个方向受了限制，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。”四渡赤水之战，如果没有中央红军在川南改变原定渡江计划，转向川黔滇边境地区机动作战，那么也就没有以后北渡金沙江的可能。这告诉我们，红军虽然在一个方向暂时放弃了原定计划，却在另一个方向为实现原定计划创造了条件，最后终于达到了预定的战略目的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指导艺术的卓越之处。

灵活把握和转换作战形式，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。2月16日，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《告全体红色战士书》指出：“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，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。在不利条件下，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、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。因此，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，有时向东，有时向西，有时走大路，有时走小路，有时走老路，有时走新路，而唯一的目的是，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。”当各路敌军奔集扎西时，红军突然调头东进，二渡赤水，挥戈东下，再打遵义，歼灭和击溃敌2个师又8个团，俘敌3000余人，缴枪2000支以上，这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胜

四渡赤水：军事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

□ 韩金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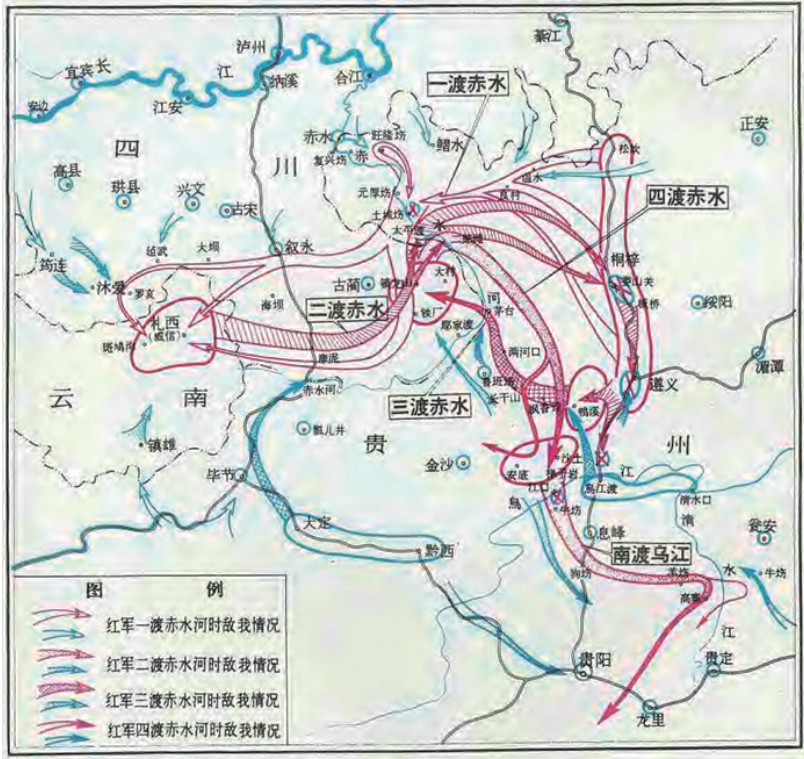
利。蒋介石哀叹这是“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”。遵义战役后，当蒋介石亲飞重庆指挥“围剿”，妄图歼灭红军于遵义、鸭溪狭窄地区时，红军又向西走了，三渡赤水，佯作北渡长江之势，迫使敌人重新调整部署。当敌人部署尚未就绪时，红军又出敌不意地四渡赤水。红军南渡乌江，佯攻贵阳，调出滇军，接着来了一个大迂回，乘虚直插云南，示形于昆明，巧渡金沙江，使我军转危为安。

毛泽东指出：“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”，“一切的‘走’都是为着‘打’，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‘打’的一个基本点上”。四渡赤水作战，如果红军没有向扎西的“走”和回师东进二渡赤水，就不可能大量调动敌人和造成有利战机；如果没有以后三渡、四渡赤水的“走”，就不能加深敌之错觉，牵着敌人的“鼻子”打转，就不能把敌人拖疲、拖垮，使红军乘隙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目的。这告诉我们，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灵活机动地运用大规模的运动战，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，以打开辟道路，走中有打，打中有走，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打，是为了保存军力，待机破敌，把走与打、消灭敌

人与保存自己辩证地统一起来，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。

巧妙变换和运用虚实行动，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。遵义战役之后，红军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，诱使更多的敌人前来围集。当敌军逼近时，红军三渡赤水，重入川南，以红9军团向叙永、古蔺方向继续前进，虚张声势，伪装主力，造成北渡长江的假象。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渡江北上，调整部署，企图对红军再次形成包围，聚歼红军于长江南岸。正当敌军向川南奔集，其包围圈将成未成之际，中央红军主力突然折向东北，于3月21夜至22日15时，分别从古蔺二郎滩、太平渡、淋滩、九溪口等渡口，第四次渡过赤水河，神速南下，进到遵（义）仁（怀）崖北侧地区，除红9军团于乌江北岸继续牵制迷惑敌人外，红军主力于31日南渡乌江，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。

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，造成敌人的错觉，实现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战略目的，毛泽东在部署红军作战行动时指出：“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。”当红军主力经息烽、扎佐佯攻贵阳，突然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城，并



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四渡赤水河示意图（1935年1月19日至4月9日）

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里的飞机场。在红军的威慑下，坐镇贵阳的蒋介石眼看贵阳城守备空虚，惊慌失措，手忙脚乱。于是，急调滇军龙云的主力3个旅昼夜兼程，增援贵阳，急令薛岳兵团和湘军何健部在川黔湘边界布防堵截。同时，严令周浑元部向东尾追。当各路敌军继续东调之际，我主力却从贵阳、龙里之间穿过敌军防线，向南而后向西急进，威逼昆明。但是，红军并未攻打昆明城，而是虚晃一枪后，乘追敌在红军后侧，金沙江两岸空虚之际，掉头北上，直指金

沙江边，从容地渡过了金沙江。至此，中央红军终于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，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滇边境地区的狂妄计划，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，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。这也告诉我们，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运用示形诱敌、声东击西、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，夺取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，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，其军事思想与领导指挥艺术，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。